

WESTER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CLASSICS

西方新闻
传播学
经典文库

ACCESS DENIE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尴尬的接近权

网络社会的敏感话题

[英]史蒂文·拉克斯 编

Edited by Stephen Lax

禹建强 王海 译

新华出版社

西方新闻
传播学
经典文库

**ACCESS DENIE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尴尬的接近权

网络社会的敏感话题

[英]史蒂文·拉克斯 编

Edited by Stephen Lax

禹建强 王海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尴尬的接近权：网络社会的敏感话题/（英）拉克斯编；禹建强，王海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10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ISBN 7—5011—6392—8

I. 尴… II. ①拉…②禹…③王… III. 计算机网络—社会问题—研究
IV. D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460 号

京权图字：01—2003—4158 号

Access Denie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opyright © 2001 Stephen La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尴尬的接近权

网络社会的敏感话题

〔英〕史蒂文·拉克斯 编

禹建强 王海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0）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插页 2 张 23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392—8/G·2319 定价：30.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65895562 65897685）

WESTER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CLASSICS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编委会成员

- | | | |
|-----|-----------|---------|
| 主 任 | 李良荣 | 复旦大学 |
| 副主任 | 郭 可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编 委 | (按姓名笔划排序) | |
| | 林 晖 | 上海财经大学 |
| | 陈昌凤 | 北京大学 |
| | 单 波 | 武汉大学 |
| | 胡正荣 | 北京广播学院 |
| | 段京肃 | 南京大学 |
| | 崔保国 | 清华大学 |
| | 蔡 雯 | 中国人民大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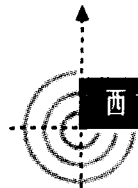
总 序

李良荣

中国的新闻改革已历经 25 个年头。25 年来，中国新闻媒体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带来新闻传播学空前的繁荣。有幸经历 25 年新闻改革的人都不会忘记，中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新闻传播学中得益良多。西方新闻传播学引入中国，给中国的新闻界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它们的许多理论、观点、概念都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理论、观点、概念对更新我们的新闻观念、改进新闻业务、改善媒体经营发挥过积极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中国正式加入 WTO。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超级大媒体纷纷抢滩中国。中国的媒体同样在跃跃欲试进入世界各国，媒体国际化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在这样背景下，中国传媒界对于世界各国、尤其对西方传媒的理念、法则、规范以及操作方法的学习、研究正掀起新一轮热潮。

这新一轮的学习、研究热潮比起上世纪 80 年代末，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那时，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西方的新闻传播学让急于寻求发展新思路的中国媒体大开眼界，他们以一种饥不择食的状态把西方新闻传播学



的一切新理论、新概念、新提法搬到中国来，甚至简单地模仿西方媒体的许多具体操作方法。但近 10 年来，尤其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新闻界，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已日趋成熟，他们理性地审视西方的新闻传播学。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但为我所用——只吸收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然后更多的是研究、思考，寻找做大做强中国媒体的道路，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和西方超级媒体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中国媒体发展的进程需要更系统、更全面地翻译、出版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为此，我们在翻译本套译本之前，特地聘请美国、英国、日本等国 12 位知名教授、学者推荐当代西方新闻传播学的代表作，并从上百本的推荐书目中精益求精，遴选出二十多本著作，涉及到新闻传播界理论、实务、法规、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并由新闻传播学、外文专业的教授、博士生、博士后担纲翻译，力求翻译的准确、规范和文字的流畅。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译著，我们特地聘请相关专家来评述译著的基本观点和学术地位。

2003 年 10 月

译者的话

世纪之末，计算机和网络等新技术的发展点燃了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希望，由此而被称为一次传播革命。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也再度风行一时。人们翘首以待新技术带来的“福音”，却只看到被舆论吹起的一个个美丽的泡沫。本书的作者们站在批判的立场，从接近权、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对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有借鉴意义。从内容上看，他们采用了新近的资料，让读者对新技术在国外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另外，研究对象也拓展到寻呼机，甚至新技术对工会、对大学生的影响，乃至后现代大学的出现等这类似乎与传播学研究无关的问题。而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还局限在新闻媒体，对手机、寻呼机等通讯工具几乎无人涉入。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以规范的定量研究或思辨性很强的定性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我们采用的大多是文献法，定量研究较少，而对定性研究，又缺乏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只能根据经验、直觉做一个判断，这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要打一些折扣。

在学术论文的规范上，对初学者也提供一个参照的模式。其论文结构

大致是“三段论”：开头是引言，界定问题；中间用定性或定量方法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

由此看来，本书对传播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和学者都不无裨益。本书前五篇论文由禹建强译，后七篇由王海翻译，由禹建强校对全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杜启新、李丽颖在翻译时也给予了帮助，一并致谢。

著者简介

罗宾·布朗 (Robin Brown) 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传播学研究院政治传播的高级讲师,《全球化和国家》(*Globalization and the State*) (即将出版) 的作者。目前即将完成《20 世纪欧洲的战争和国家》(*War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威廉·达顿 (William Dutton)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安南堡传播学院教授。近几年,他指导英国的信息和传播技术规划 (PICT)。最近,他以此为基础出版《网上社会: 数字时代的信息政治学》(*Society on the Line: Information Politics in the Digital Age*) (1999) 一书。

安尼塔·埃尔伯斯 (Anita Elberse) 伦敦商学院 (London Business School) 未来媒体研究规划的博士研究生, 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学位。她研究的重点是传媒产业技术发展的意义。

加里·赫尔曼 (Gary Herman) IT 顾问和作家。1987—1991 年, 出任国家计算机运算中心 (National Computing Centre) 出版委员会主席。

从1993年,他密切关注劳工信息远程传送技术中心(Labour Telematics Centre)。关于信息和传播技术,他著述颇丰,包括为计算机出版物所撰写的技术报告和文章。自从1989年,他发起了许多宣传DTI的运动,涵盖开放系统、软件工程和信息社会。

乔·霍利(Joe Holly)工人教育协会国家规划处(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 National Programme)的理事,致力于为学习和教育而开发、合作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他是劳工信息远程传送技术中心主任,该组织为工会会员提供在新技术的使用和影响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并担任创业中心主任(Centre for Employment Initiatives)。面对日益发展的工作全球化,他设计革新的培训和教育项目。

特蕾西·洪(Traci Hong)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吉尔·柯卡普(Gill Kirkup)开放大学教育科技(Educational Technology, Open University)的高级讲师,目前编辑读本《有用的受控机体:性别和技术科学的代表》(*The Useful Cyborg: Representing Gender and Technoscience*)。这是她的第二本关于性别和技术的读物。第一本(与L·S·凯勒(L. S. Keller)合著)《创造女性》(*Inventing Women*) (1992)于1998年重印。她写作和发表了广泛的有关女性和技术、性别和远程教育方面的论著。

斯蒂文·拉克斯(Stephen Lax)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传播学研究院传播技术讲师,另著有《跨越地平线:传播技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Beyond the Horiz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997),他组织协调由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的系列研讨会——“告知或预警:新传播技术的社会含义”(Informed or Forewarned: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1996-98)。

索林·马太(Sorin Matei)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博士研

究生，在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民主与法律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Law, Tufts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文学硕士。以前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报道的制片人，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国际传播和新媒体的社会生态。

· **戴维·E·莫里森**（David E. Morrison）利兹大学传播学研究院传播研究的教授，他还在该学院担任研究中心主任。他最近出版了《探求一种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The Search for A Method: Focus Gro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8）。

迈克尔·帕尔默（Michael Palmer）巴黎的新索邦大学（Sorbonne Nouvelle University）传播学院国际传播教授。关于法国和英国传媒史和国际通讯社，他著述甚广，写有《从小报社到大通讯社》（*Des petits Journaux aux Grandes Agences*）（1983）一书，并与杰里米·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合著《传媒巨子》（*Media Moguls*）（1991）。

迈克尔·斯文内韦（Michael Svennevig）利兹大学未来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在独立电视委员会（ITC）和英国广播公司任研究员，是国际研究的媒介中心主任。著有《跨时代的电视：英国公众的观点》（*Television Across the Years: The British Public's View*）（1998）。

德博拉·特雷赫恩（Deborah Trayhurn）利兹都市大学（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信息管理学院首席讲师。

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社会学教授、《信息社会的理论》（*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1995）的作者，他与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合著《技术文化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1999），与加里·布朗宁（Gary Browning）和艾比盖尔·哈尔克里（Abigail Halcli）合编《理解现代社会：存在的理论》（*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

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2000)。

安东尼·威廉 (Anthony Wilhelm) 华盛顿特区本顿基金 (Benton Foundation) 传播政策与实践项目负责人。威廉博士研究和发表作品的重点是通过新媒介使用的显著增长——如因特网和数字电视——以及渐进的公共政策, 探索社会上“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的表现方式。他著有《民主和数字鸿沟》(*Democrac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2000), 这本书分析在网络世界实现民主化公共生活的几个关键问题。

格兰维尔·威廉斯 (Granville Williams) 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讲授新闻和传媒政策。他为报纸和广播自由运动编辑出版物《新闻自由》(*Free press*), 是媒介频道 (Media Channel) (<http://www.mediachannel.org>) 的顾问, 该频道从全球化的视角, 寻求关于媒介当前可选择的新闻和观点。

布赖恩·温斯顿 (Brian Winston) 威斯敏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传播、设计和媒介学院的教授和主任。曾任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摄像研究会长以及格拉斯哥大学 (Glasgow University) 媒介集团创立研究中心主任。作为一个电视专业人士, 他制作了《行动中的世界》(*World in Action*), 并因纪录片脚本创作获得艾美金像奖^① (Emmy)。最近出版的专著包括《呼唤真实》(*Claiming the Real*) (1995) 及《媒介技术与社会》(*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998)。

^① 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对在电视节目安排、演技等方面有卓越成就者所颁发的奖项。——译注

前言

□ 斯蒂芬·拉克斯

人们期望随着新千年的来临，许多观察家所声称的我们站立在新社会的门槛上成为现实。我们没有失望。媒体对高科技和网络股票市场上疯狂的资本投机兴奋不已，这就是支持上述声明的一个例子。这个新社会被贴以各种标签——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或“信息时代”。本书的作者们考察了今日世界的各种特征，却没有找到一个新信息社会的证据。

但我们确信信息时代降临了，因为 21 世纪最关键的商品是信息。最近 40 年或 60 年间，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信息能以与货物运输在性质上（和数量上）截然不同的速度在全世界流动。这产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种结果：信息产业不再限于某一地点，这样它在能获得利润最大化的任何地方招募员工；政府在采用新技术，使新信息更广泛、更平等为民众所用的同时，可能也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处理它们同企业的关系。

这卷书的作者们对当前这个时期持有多少有点另类的看法。毋庸置疑，在最近 40 年或 60 年来，传播技术急速发展。随之而来，传播技术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然而，只有在观念上有一个巨大的跨越，人们才有可能论证这正导致一种颠覆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新型社会的产

生。本书的论文没有强调应该从当前、而不是未来想象中的优势这一视角来考察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ICT）。毕竟这些技术正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下使用，该体系多多少少已经完成它的全球化战略，目前世界上不存在不被看作一个潜在的市场或者劳动力和利润来源（或者，当然二者兼有）的地方。许多跨国公司有几十亿美元的营业额，这使几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形见绌——比如，“比尔·盖茨一人比联合国 185 个成员国中的 135 个更富有。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的总销售收入超过希腊、爱尔兰和卢森堡三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伦纳德和阿拉克森 Leonard and Alakeson 2000: 20）。在这个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并无消失的迹象，而这些不平等影响任何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应用。因此构造新技术能改善这种状况的论点是一个挑战，而这显然具有政治上的吸引力，所以跨入这个领域的政治评论家曾赞同用新技术解决社会问题。

很多评论（并且太多的出版物称赞“网络政治学”（cyber-politics）、“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或者“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类似的表达）认同信息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础。于是在未来，根本的不平等将由于对信息的接近权而得以改善。如果因特网通过个人电脑易于接近，并且最近借助数字电视系统或者移动电话已经可以使用（尽管以有限的形式），那么在信息经济中，促进机会的平等就意味着首先确保能用得起技术、能接近技术。某些制度性的障碍不会以这种方式阻挠接近权，例如，在“过时”物质或金钱经济中，事实表明，带有种族或性别标记是获得成功的障碍。于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体系将在网上产生。

当然，这种论点过于简单化。尽管以上的描述可能是某种可笑的模仿，仍然有许多人声称制度性障碍和权力问题不再像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起到的作用那么大。但是如果人们采用这种思考方式，很可能认为所有人目前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都上学）；或者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民主权利（我们都投票，并且能给下院议员写信）。但我们的确没有。“接近



权”以及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ICT）涉及更复杂的问题——这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拒之门外的接近权

当然，对新的信息设备的物质接近权确实是一个问题。然而获得对新技术的接近权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接下来，它也导致一系列问题：技术怎样被利用？突然之间可接近的信息提供了新知识，但是它有什么价值？如果新技术提供的信息不被认为是重要的或有意义的，为何人们为此困扰？因此，人们在赞美新信息技术时，必须拷问它是否促进真正知识的增加。一旦提出信息性质的问题，我们必须拷问是谁作决定？何种信息可用？并且重要的是，何种因素决定我们获得的新知识的用途？换言之，在由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进步改变的社会里，权力关系是怎样的？

接近权

当然，大量的讨论集中在因特网，因为对这项技术的接近权肯定是不平等的。相比之下，对分配稍显公平的技术——寻呼机（在美国）或者移动电话（在英国）几乎没人关注。在第一章，威廉·达顿、安尼塔·埃尔伯斯、特蕾西·洪和索林·马太考察寻呼机在美国的使用情况，尤其是1998年“银河四号”卫星运转失灵，导致整个美国的寻呼机通讯中断，他们考察了当时人们的反应。与媒体（其他地方）上发表的公认为颇有见地的观点相反，人们现在依赖这些技术，并以某种方式受它们的束缚（比如在工作或家庭中）。达顿等人表明大多数人使用寻呼机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然而缺少它，人们也能快乐地面对。他们得出结论：人们不是被技术管制，而是以适应他们的方式与技术结合。

然而，对其他技术的接近权，如计算机（在家庭或在工作中）是极不

平等的，存在着阶层、性别和种族的差异。经济因素（也就是设备的价格）在团体还是在私人层面都是一个问题。加里·赫尔曼和乔·霍利认为工会应该充分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来推进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承认接近权（不仅对技术本身、而且对使用技能的接近权）不总是简单的事情。在第三章，吉尔·柯卡普洞察到接近权的基本问题——使用个人电脑的性别不平等。并且认为尽管网络女权主义呼吁要求归还失去的键盘，事实上性别关系与过去并无二致。

知识

信息不名一文，除非它有意义。换言之，如果我们接触信息时并没有获得知识，我们就无法从中受益。因而思考在信息易于交流的世界里知识的状况很有意义。弗兰克·韦伯斯特（第四章）反对那些宣布“传统”的大学终结的人。传统的大学作为一个审视和分析思想（和信息）的地方，知识和探求真理受到尊重。韦伯斯特将高等教育不可否认的变化条分缕析，认为与其说这是新型大学（“后现代大学”）出现的明证，不如说是屈服于市场法则和缺少资金的结果，并且传统大学的理念及其在许多情况下的做法仍在盛行。德博拉·特雷赫恩（第五章）进一步揭示高等教育具有持续性而没有转型——在这个个案中，就计算机运算和技术课程存在的性别差异而言，这一点是不受欢迎的。在这些论题中，按照“信息社会”的观点，人们本可能期望性别差异开始缩小。她却发现尽管经过40年的努力，传统的性别角色依然像以往一样牢不可破。

英国政府计划（借鉴美国）把所有学校和公用图书馆都与因特网相连，宣称其目标是提供较平等的信息接近权，这是最清晰的目标之一。斯蒂芬·拉克斯认为（第六章）该目标不可能成功，因为它不承认社会分裂（division）的真正性质。相反，他提出社会裂缝很可能扩大，并且再进一步，准许公共空间和知识的私人化也是很有可能的。戴维·莫里森和迈克



尔·斯文内韦（第七章）利用广泛的数据证明，任何声称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正在转变人们的态度、信仰或者生活方式都是认识上的错位。采用任何新技术都趋于实用而非意识形态的原因，因此这不会趋于改变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章节（第八章），迈克尔·帕尔默考察在知识生产过程本身，先进技术的使用情况。他被准许查看路透社的质量控制和内部报告，在1999年北约对前南斯拉夫进行轰炸时，帕尔默调查该通讯社如何监视自己及其竞争对手的报道。他揭示通讯社指挥部怎样不分昼夜地快速收集反馈，以帮助调整这次战争的报道方式。

权力

关于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第三个问题是它们是否破坏现存的社会结构。因为可能会这样，至少从定义上，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普遍接近权是通过公用访问点实现的（比如，在图书馆和社区中心）。难道这本身是赋予权力给无权者，或者剥夺有权者的权力吗？为了证明信息和传播技术预示一种更平等和精英统治的新型社会的来临，人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说“是”。然而，布赖恩·温斯顿在第九章提醒我们，因特网的历史像许多其他的技术（传播或别的技术）一样。因特网起源于军事研究机构，随后转移到学术圈，再快速地进入自由市场，这个经历与电话和无线电如出一辙。因此如同以前的发展，这充分代表以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统一市场（如以信息为基础的娱乐和电子商务市场）。格兰维尔·威廉斯提供了证明，他（第十章）阐述了媒体帝国的并购使大公司得以控制整个媒介和传播世界。

从普遍接近权的视角，安东尼·威廉在第十一章讨论美国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他认为如果没有持续的社会改革，位于信息和传播技术阶梯底层的人们毫无希望提升他们的地位。他提出尽管传媒产业的大